

旅游驱动下乡村转型发展的微尺度研究 ——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

吴孔森¹, 芮 旻^{1*}, 陈 佳¹, 张丽琼², 杨新军¹, 张佰刚¹

(1.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西安 710127; 2. 西北大学图书馆, 西安 710127)

摘要:基于多要素综合视角, 论文从土地与生计2个维度构建微观尺度的乡村地域系统概念模型; 融合遥感影像数据、问卷调查数据及访谈资料等多源数据, 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 探究“城郊村”在旅游驱动下的土地利用和农户生计转型, 并对其与“景边村”的转型发展进行案例较析。结果表明: ① 伴随乡村旅游发展的规模化和专业化, 上王村的土地利用日益多样化、复合化、旅游化, 农户生计方式组合渐进更替, 家庭就业、收入、消费与旅游的相关性不断提高, 由传统农业村转型为乡村旅游目的地。② 上王村的转型发展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优越的区位条件是其前提和基础, 政府的适时调控是“稳定器”和“方向盘”, 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壮大和农户的理性选择是外源拉动力和内在驱动力。③ “城郊村”和“景边村”因区位不同而在地形条件、依托资源、客源市场等方面存在差异, 引致两者乡村旅游开发的分化, 同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转型发展进程。

关键词:乡村旅游; 乡村转型发展; 土地利用; 生计变迁; 西安市上王村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中国乡村正在不断转型发展^[1]。乡村转型发展, 即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乡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空间结构发生重构, 农民就业方式、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发生变化的现象及过程^[2-4], 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正式提出后, 乡村转型发展成为热点议题^[5-10]。如何在当下科学整合城乡发展要素, 转变乡村生产要素向城市的单向流动, 重构乡村地域系统, 进而促进乡村转型发展, 事关中国乡村全面振兴大局。

鉴于此, 已有众多学者对乡村转型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多以“乡村重构”为主题,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探索,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人口变化、土地利用和农户收入等。如

Kiss^[11]在其研究中以乡村经济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为重点解析乡村重构; Abrams^[12]以社会、经济和政策的变化为背景, 从人口和土地变化视角研究美国乡村社区重构; Torres等^[13]则分析了新自由主义与乡村转型、土地转型及人口移民之间的关联; Hedlund等^[14]从乡村转型—就业转移—人口迁出3个维度, 分析了瑞典乡村经济转型。国内学界对乡村转型发展的研究, 经历了从单要素视角到多要素视角、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 已由理论分析过渡到实证研究的新阶段。诸多学者从土地、人口、产业等视角出发, 对乡村转型模式与路径^[15-17]、区域乡村转型格局^[18-21]、乡村转型影响因素^[22-23]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究, 极大地丰富了乡村转型发展的案例研究。亦有部分学者立足专业村, 对微观尺度的乡村转型发展进行了探索; 并且随着乡村旅游的迅猛发展, 旅游

收稿日期: 2019-07-09; 修订日期: 2019-10-2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01174);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9YJCZH06); 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计划项目(2018JM5109)。[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1601174; MOE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19YJCZH06; Natural Science Basic Research Project of Shaanxi Province, No. 2018JM5109.]

第一作者简介: 吴孔森(1992—), 男, 河南商城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乡村人地关系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E-mail: kongsenwu@126.com

*通信作者简介: 芮旻(1985—), 男, 安徽合肥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城乡转型与空间治理研究。E-mail: ruiyang@nwu.edu.cn

引用格式: 吴孔森, 芮旻, 陈佳, 等. 旅游驱动下乡村转型发展的微尺度研究: 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6): 1047-1059. [Wu Kongsen, Rui Yang, Chen Jia, et al. Micro-scale study o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driven by tourism: Taking Shangwang Village in Xi'an City as an exampl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6): 1047-1059.] DOI: 10.18306/dlkxjz.2020.06.014

村已成为该类研究的主阵地,研究内容多集中于乡村聚落地格局演变^[24-26]、社会空间重构过程及其驱动力^[27-28]、农户生计变迁及其影响因素^[29-30]等方面。尽管已取得丰硕成果,但现有相关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实证研究多以县域及其以上尺度为主,对微观尺度的乡村转型发展关注不足;其次,现有村域尺度的微观研究多以土地利用变化、空间重构或产业发展等单一要素为主,从多要素综合视角出发探究乡村转型发展进程的成果较少。因此,在村域尺度调整优化乡村地域系统概念模型,多要素联合对特定扰动下乡村转型发展过程及机理进行案例实证,成为当前研究的迫切需求。

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乡村旅游业得到了迅猛发展,逐步成为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为此,本文选取典型的大都市近郊乡村旅游地——西安市上王村进行实证研究。以土地利用格局和农户生计发展演变为主线,刻画乡村旅游驱动下的上王村转型发展过程,探究背后的机制;选取同处陕西省秦岭地区、位于商洛市金丝峡景区旅游专线沿线的4个“景边村”为对照组,较析区位条件不同的乡村在旅游开发影响下的转型发展特征,以期旅游驱动下的乡村振兴路径设计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上王村隶属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滦镇街道,南靠秦岭、北邻环山路、西近210国道,紧邻秦岭野生动物园等景点,区位条件优越,是典型的城郊型乡村旅游地(图1)。该村自2003年起抓住西安市发展秦岭旅游的机会,鼓励和引导村民开办农家乐,并将其规划为主导产业。截至2017年底,上王村共发展农家乐经营户186户,经营户人均年均收入3.5万元。随着添福耕园、上王古镇、秦岭上王温泉度假酒店等旅游项目的陆续建成,上王村已从以务农、务工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传统农业村庄,发展为集特色餐饮、农事体验、休闲娱乐、养生度假等多功能于一身的旅游目的地,乡村经济的转型和物质空间的重构明显。

1.2 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的土地利用数据包括2000、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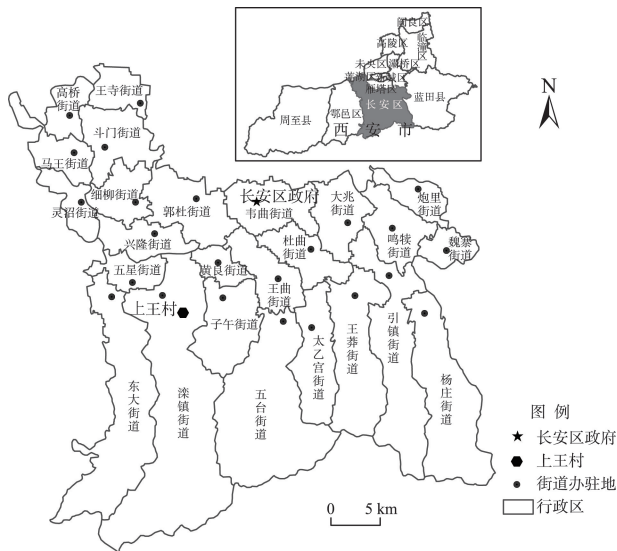


图1 上王村区位

Fig.1 Location of Shangwang Village

2010、2015年4期,分别来源于Google Earth高清影像解译和入户调查。首先,对4期影像数据进行解译,形成初步的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图;然后,实地走访,重点对最早从事农家乐的农户、任职多年的村干部及农家乐协会的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对村内道路、停车场及农户家庭住房进行标注,在访谈人员指导下对初步解译的成果进行调整,进而形成土地利用数据。

农户生计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式访谈。前者采取随机调查方式对长期参与旅游经营的当地农户进行针对性发放,对象包括农家乐经营户、旅游商店经营户等不同类型的旅游业参与户;后者主要是对村“两委”、管理人员及参与旅游业的先锋农户进行深度访谈。课题组成员于2014年10月1日对上王村进行了预调查。基于预调查情况完善问卷后于2014年12月10—15日进行了调查问卷的集中发放,每户问卷调查时间约30 min,共发放问卷62份,收回有效问卷62份,有效率100%。考虑到问卷的样本代表性,课题组于2019年4月3—6日进行补充调研,补充问卷43份,其中有效问卷为41份,有效率95.35%。问卷内容包括:①农户家庭基本状况(性别、年龄、职业、健康状况、文化水平及收入状况等);②旅游开发前后农户的生计方式、生计资产及收入消费结构变化状况等^①。半结构式访谈与问卷发放同时进行,共收回访谈录音20份,内

① 2017年底上王村共有232户农户,有效问卷共103份(因2次调研问卷均有记录农户所处的路巷名称与户号,避免了对同一农户的重复调研),占农户总数的44.40%,调研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容主要包括:①上王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及其产生的影响;②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与农家乐发展的时间历程;③农户参与旅游发展的动机、生计适应选择及未来计划等。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考虑2次调研的时间差异,将涉及的有关收入与消费的数据基于可比价计算,统一到2017年的标准。

2 研究方法

2.1 旅游驱动下微观尺度的乡村地域系统概念模型

乡村地域系统是由多种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综合多维性和动态演变性的开放系统,人口、土地和产业是影响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31-32]。区别于县域尺度,在村域尺度,农户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也是集人口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功能于一身的微观主体,可以说是乡村转型发展最直接的推动者^[33]。而微观尺度上乡村人口和产业要素结构的变化,可通过农户生计活动的变迁得到体现。鉴于此,笔者对已有的“人口—土地—产业”视角进行整合,从土地和生计2个维度构建旅游驱动下微观尺度的乡村地域系统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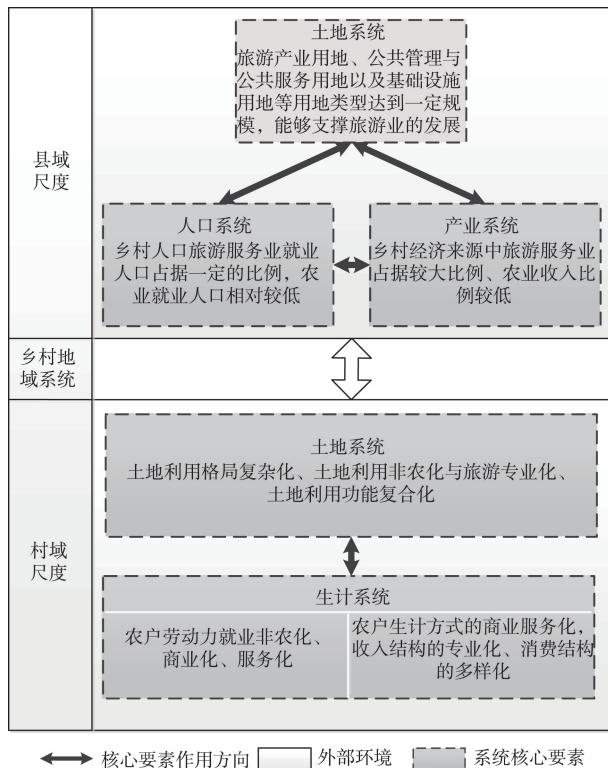


图2 旅游乡村地域系统概念模型

Fig.2 A conceptual model of tourism-oriented rural regional system

在村域微观尺度,土地系统与生计系统对乡村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是孤立的,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会引起另一个子系统变化的连锁反应,进而使得整个乡村朝特定方向发展。其中,土地是农户生计活动的空间载体,农户生计活动离不开土地的支撑;农户生计活动的变迁则必然会反映在土地利用变化中,并使土地资源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重新得以配置。

2.2 村庄土地类型划分

中国乡村发展的地域差异大,对乡村土地利用类型的划分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因此,本文基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和《村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参考已有相关研究^[34],结合实际调研,建立分类体系如表1所示。

2.3 土地利用转型测度指数表征

为明晰旅游影响下乡村土地利用的转型情况,本文引入土地利用结构转型指数与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描述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的变化特征。

(1) 土地利用结构转型指数

$$\theta = \cos^{-1} \left\{ \frac{\sum_i S_i(t) \times S_i(t-n)}{\sqrt{\left[\sum_i S_i(t)^2 \right] \times \left[\sum_i S_i(t-n)^2 \right]}} \right\} \quad (1)$$

式中: $S_i(t)$ 与 $S_i(t-n)$ 分别为地类*i*在*t*年与*t-n*年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θ 为土地利用结构转型指数。该指数用来衡量2个时间点之间的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当前后2个时间点上所有地类面积均未变化, θ 指数为零;反之,如果在*t-n*年土地利用全集中于某一地类,*t*年土地利用全部集中于另一地类,则 θ 指数为90;其他情况下, θ 指数在0到90之间变动,该指数可以用来衡量任意年份间土地利用结构的总体变化。

(2) 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

$$D = - \sum_i P_i \ln P_i \quad (2)$$

式中: P_i 为地类*i*的面积在区域土地面积总和中所占的比例, D 为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 D 值在0~1之间变化,当*D*值为0时,说明区域仅有1种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利用多样性低;当*D*值为1时,说明区域各类用地面积分布均衡,土地利用多样性程度高。

表1 旅游村土地利用分类体系

Tab.1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rural tourism sites

一级类	二级类	含义
住宅用地	一般住宅用地	单一居住功能的住宅用地
	复合住宅用地	兼具做小生意、农家乐接待功能的住宅用地
	特殊住宅用地	具有商业性质的别墅用地
产业用地	旅游业用地	提供购物、餐饮食宿与娱乐活动的旅游产业用地
	仓储用地	包括手工业、食品加工业等仓库堆场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	科教文卫及公共管理用地
基础设施用地	交通过地	包括道路与停车场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村庄公厕、垃圾处理等场所用地
耕地	—	—
园地	—	—
林地	—	—
水域	—	指天然形成和人工构建的河流与坑塘水面
设施农用地	—	依赖设施等进行农业生产的农用地以及村庄晾晒场等农业设施用地
其他土地	—	村庄未利用土地以及宗教性质用地

3 结果与分析

3.1 上王村土地利用转型分析

根据上王村2000、2005、2010、2015年土地利用判别结果(如图3),依据构建的村庄用地分类体系,对各时点的土地利用状况进行分析(表2、表3),明晰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土地利用转型特征。

3.1.1 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演变

从图3可知,上王村土地利用在空间布局上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且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不断发生演变。2000年,上王村土地利用呈现典型的“核心居住功能+边缘传统农业生产功能”的空间布局结构,住宅用地分布在村庄中心,周围布局耕地、林地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地,地块完整度较高,经济活动单一,传统农业生产是村庄的主要经济功能。2005年,上王村住宅用地逐渐向南北两侧扩张,且逐步增加了旅游接待功能;耕地面积有所减少,但依然成片分布在村庄边缘,土地利用逐步演变为“核心居住/旅游接待功能+边缘传统农业生产功能”的空间布局结构。该阶段上王村乡村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旅游参与方式以单纯的农家乐接待为主,对土地利用类型分布的影响较小。到2010年,上王村住宅用地与旅游接待用地继续向南扩张,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传统的大田农业生产逐步被观光休闲农业所取代。村庄基础设施用地逐渐增加,并与住宅用地交织分布,土地利用表现出“核心旅游接待/居住功能+边缘休闲农业功能”的

分布特征,土地利用逐渐趋向均衡。2015年时,上王村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呈现出典型的镶嵌式特征,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农业生产功能几近消失;住宅用地、产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规模持续增加,地块破碎化特征明显,用地整体呈现出“核心旅游接待/居住功能+边缘旅游综合服务功能”的分布特征,并向特色餐饮、观光休闲、康养度假等复合功能演变,各类旅游功能用地扩展显著,村庄转型发展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旅游专业村。

3.1.2 土地利用规模结构演变

从表2、表3可知,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上王村土地利用整体呈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住宅用地(特别是复合住宅用地)、基础设施用地、产业用地(特别是旅游产业用地)和其他土地面积持续增加,农业生产功能逐渐消失、旅游接待与服务功能逐步增强的特征。

2000年,上王村以耕地、住宅用地和林地等类型用地为主,其分别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69.69%、11.16%和10.43%。此时,上王村乡村旅游虽已萌芽,但受限于当时的客源市场规模,依然是典型的传统农业村庄。随着秦岭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上王村先锋农家乐的经济效益好转,不仅逐步扩大经营规模,也引发了邻里乡亲从事农家乐的连带效应,导致住宅用地及其他土地不断增多。截至2005年,上王村耕地面积比重降至52.19%,住宅用地、其他土地增长至14.12%、15.56%,土地多样化指数由2000年的0.46增长至0.61,结构转型指数为16.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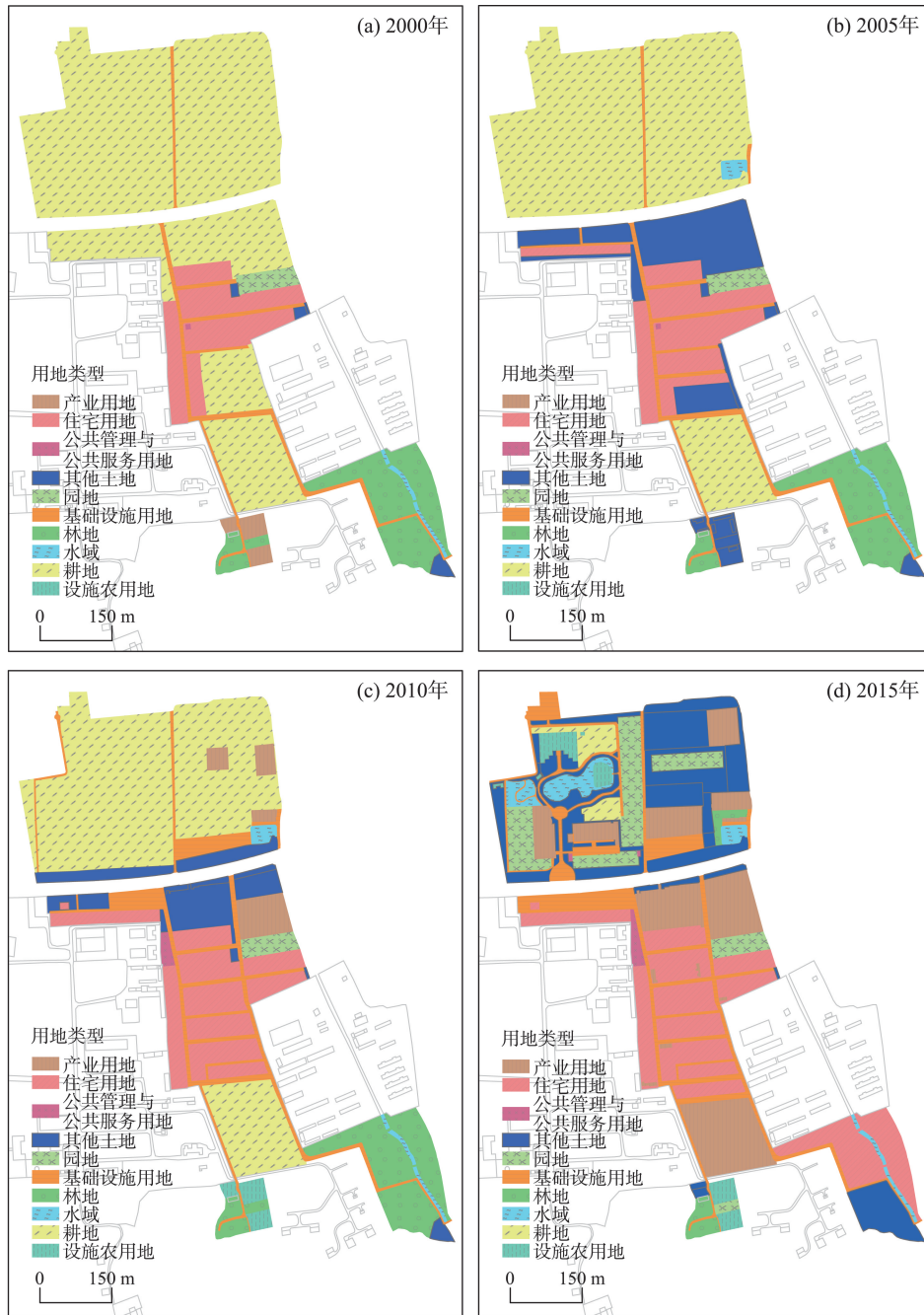


图3 上王村土地利用格局演化

Fig.3 Change of land use pattern of Shangwang Village

土地利用开始转型。

随着乡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原有的农家乐接待场所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旅游接待服务需求。为提高旅游接待能力,上王村不断扩大农家乐经营面积,改善村庄基础设施,致使村庄住宅用地、基础设施用地面积不断增长,其他土地(主要是绿地与空闲地)面积有所下降,截至2010年,3类用地面积比重分别为16.38%、9.91%和9.89%,而耕地在

这一过程中不断减少,比重降至45.34%。这一阶段是上王村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阶段,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增长至0.72,结构转型指数增长至32.11,土地利用结构转变明显,耕地的主导地位不断下降,旅游接待及其服务功能不断增强。

外来企业资本的注入促使上王村乡村旅游发展逐步迈入多主体参与的成熟阶段,产业用地、住宅用地、基础设施用地与其他土地规模继续增长,

表2 上王村土地利用结构

Tab.2 Structure of land use in Shangwang Village

用地类型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面积/m ²	比例/%	面积/m ²	比例/%	面积/m ²	比例/%	面积/m ²	比例/%
产业用地	5915.92	1.40	0	0	16770.39	3.96	82681.44	19.52
耕地	295156.00	69.69	221030.31	52.19	192026.41	45.34	10534.15	2.49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36.34	0.03	136.34	0.03	1841.51	0.43	2744.66	0.65
基础设施用地	20125.19	4.75	23717.99	5.60	41986.27	9.91	63735.68	15.05
林地	44171.01	10.43	42932.73	10.14	44171.01	10.43	6759.90	1.59
其他土地	2970.92	0.70	65896.70	15.56	41900.78	9.89	90408.80	21.35
设施农用地	0	0	0	0	5915.92	1.40	11733.59	2.77
水域	2181.10	0.51	4378.26	1.03	4378.26	1.03	14235.16	3.36
园地	5619.64	1.33	5619.64	1.33	5187.19	1.23	39582.01	9.34
住宅用地	47258.95	11.16	59823.10	14.12	69358.18	16.38	101119.90	23.88
总用地	423535.08	100.00	423535.08	100.00	423535.08	100.00	423535.08	100.00

表3 上王村土地利用格局指数演变

Tab.3 Change of land use pattern index value in Shangwang Village

年份	多样性指数	结构转型指数
2000	0.46	—
2005	0.61	16.56
2010	0.72	32.11
2015	0.83	78.74

耕地面积则持续减少。从表2和表3可知,产业用地比重由2010年的3.96%增长至2015年的19.52%,住宅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和其他土地面积比重分别增长至23.88%、15.05%和21.35%,而耕地面积比重则由2010年的45.34%降至2015年的2.49%,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增至0.83,土地利用结构转型指数增至78.74,各类用地较为均衡,但结构已完全转变,村庄由传统农业村转型为乡村旅游目的地。

3.2 上王村农户生计转型分析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传统的农业生产已不能支撑上王村生计的发展。自然资本的锐减以及产业间收入差异,导致上王村农户逐步放弃了原有的以传统农工为主导的生计方式,开始从事农家乐经营和其他旅游接待服务行业,农户生计逐步转型。

3.2.1 生计策略转型

在乡村旅游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王村农户生计存在着不同的组合方式(如表4)。

在乡村旅游发展萌芽阶段,对口特定单位的农家饭接待是上王村参与乡村旅游的主要形式。由于客源的偶然性,农户参与程度低,乡村旅游只能充当农户生计的补充,务农为主、农闲务工是上王村最主要的生计组合方式。随着游客规模的增长以及先锋农户经济效益的显现,上王村农家乐经营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截至2004年底,上王村农家乐经营户数量已达96户。该阶段中上王村乡村旅游发展较快,但传统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并未发生改变,务农为主、农家乐经营和务工为辅成为上王村农户新的生计组合形式。

政府适时干预以及农家乐协会的成立,推动了上王村乡村旅游逐步迈入了规范化与标准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农家乐经营逐渐成为上王村最主要的生计方式,传统农业生产逐步消失,农户生计过渡到农家乐经营为主、旅游淡季务工和观光休闲农业经营为辅的组合形式。截至2017年底,上王村共有农家乐经营户186户,乡村旅游发展步入成熟期。这一阶段,农家乐经营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在新开发的景点中从事服务工作成为上王村农户新的生计方式,农家乐经营为主、旅游服务

表4 上王村农户生计组合演变

Tab.4 Change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y combination in Shangwang Village

旅游发展进程	萌芽期	起步发展期	快速发展期	发展成熟期
生计组合	务农(主导)+ 务工(农闲)	务农(主导)+农家乐经营+ 务工(农闲)	农家乐经营(主导)+务工(旅游淡季)+ 务农(观光休闲农业)	农家乐经营(主导)+旅游服 务+务工(旅游淡季)

和务工为辅,成为上王村农户生计新的组合方式。

根据生计组合方式、家庭劳动力投入方向及收入构成,将上王村农户划分为旅游兼营型(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0~40%)、旅游主导型(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40%~80%)、旅游专营型(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80%~100%)3类(表5)。

旅游专营型:该类农户生计主要以农家乐经营、旅游超市与手工艺品商店为主要生计选择,占调研样本总量的46.74%。其参与乡村旅游程度较高,户均旅游就业人数为3.02人,户均旅游经营面积为143.04 m²,与其他2类农户相比较高;户均生计多样性指数为1.41,与其他2类农户相比较低。由于该类农户对乡村旅游参与度较高,导致其户均家庭纯收入高于其他2类农户,为10.23万元。

旅游主导型:该类农户生计组合多为“旅游经营+家庭剩余劳动力务工”,占样本总量的33.70%。其参与乡村旅游程度低于旅游专营型农户,户均旅游就业人数为2.45人,旅游经营面积为135.48 m²;

家庭劳动力一般较多,剩余劳动力务工或季节性务工为其家庭生计的补充,因此家庭生计多样性与旅游专营型农户相比较高,为2.11。在家庭收入方面,该类农户户均年纯收入为9.81万元,高于旅游兼营型农户。

旅游兼营型:该类农户生计组合多以“常年务工(户主)+旅游经营(妇女老人)”为主,占样本总量的19.56%。其旅游参与程度低,户均旅游就业人数为2.00人,旅游经营面积为111.13 m²,均小于其他2类农户。该类农户户均常年务工人数为0.94人,高于其他2类农户,务工在其家庭生计中仍占有较高地位。在家庭收入方面,该类农户户均年纯收入为6.69万元,明显低于其他2类农户。

3.2.2 经济结构转型

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重构了上王村农户的生计方式,也改变了其家庭经济结构(图4、图5)。如图4a可知,乡村旅游发展前,将农业收入作为家庭收入首要来源的样本农户占比为56.67%,而将务工收入作为家庭收入首要来源的样本农户占比为40.00%。可见,在乡村旅游发展前,传统农业生产与务工是农户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上王村发展处于传统的农工结合阶段。乡村旅游发展后,农户生计选择发生改变,收入结构也随之发生转型。从图4b可知,乡村旅游发展后,在农户收入结构中旅游收入的占比为76.07%,农业收入地位急剧降低,仅占到总收入的0.21%,主导地位已被旅游收入取代;务工收入占到总收入的17.93%,仍有一定份额,主要来源于农户在旅游淡季或家庭剩余劳动力

表5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上王村农户生计策略

Tab.5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Shangwang Villa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ural tourism

农户特征	旅游专营型	旅游主导型	旅游兼营型
样本比重/%	46.74	33.70	19.56
旅游就业人数/人	3.02	2.45	2.00
常年务工人数/人	0	0.26	0.94
经营面积/m ²	143.04	135.48	111.13
年纯收入/万元	10.23	9.81	6.69
生计多样化指数	1.41	2.11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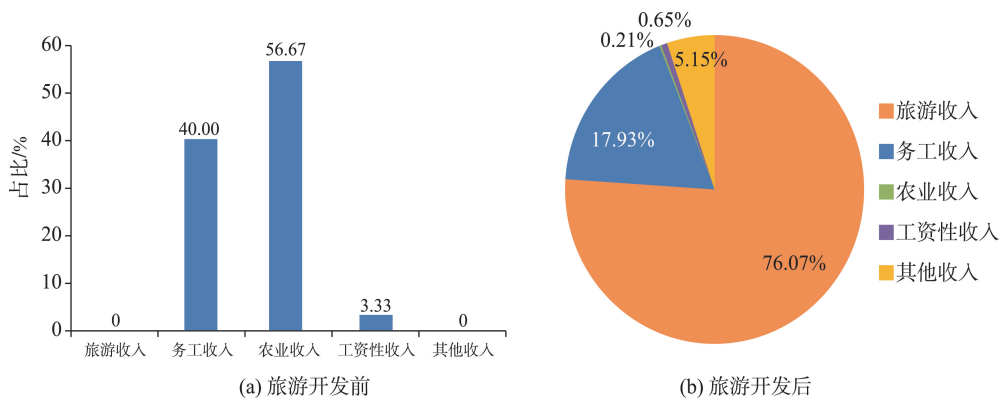


图4 上王村农户收入结构变化

Fig.4 Change of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in Shangwang Village

② 由于旅游开发前农户家庭收入与支出具体的情况难以调查,因此在问卷设计中以农户家庭首要收入来源与消费支出为统计项,进行家庭收入与支出情况的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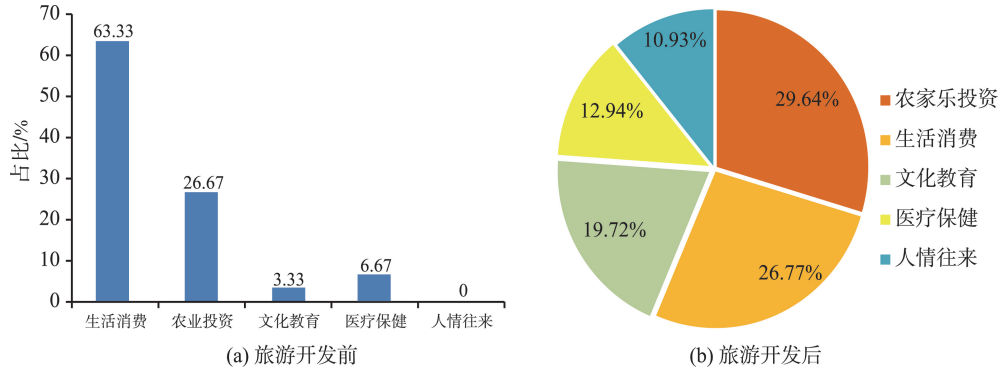


图5 上王村农户消费结构变化

Fig.5 Change of farmers'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Shangwang Village

外出务工所得。可见,上王村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转变,现处于旅游业为主要来源的新阶段。

在消费结构上,从图5a可知,乡村旅游开发前将生活消费作为首位消费的农户占调研样本的63.33%,将农业投资作为首位消费的农户占26.67%,将文化教育与医疗保健支出作为首位消费的占10.00%。可见,在乡村旅游开发前,农户生活消费与农业投资是家庭经济支出的主要方向。从图5b可知,乡村旅游发展后,在农户消费结构中农家乐投资占农户家庭消费总额的比例最大,为29.64%;其次为生活消费,占26.77%。可见,生产生活消费在农户家庭消费结构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但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以及农户生计方式的变化,农户消费支出逐渐均衡化与多样化。

3.3 上王村转型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上王村的转型发展主要是政府、农户、资源、市场等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以区位条件为基础,在乡村旅游市场需求拉动下,政府调控渐进式介入和农户适应行为等要素综合推动的过程(图6)。

区位条件是上王村转型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上王村地处秦岭北麓、西安南郊,周边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丰富,旅游区位优势。所处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及景点集群效应的显现,给上王村乡村旅游带来了充足的游客。正如前村支书王某所述:“我们村周边的旅游资源还是挺丰富的,像动物园、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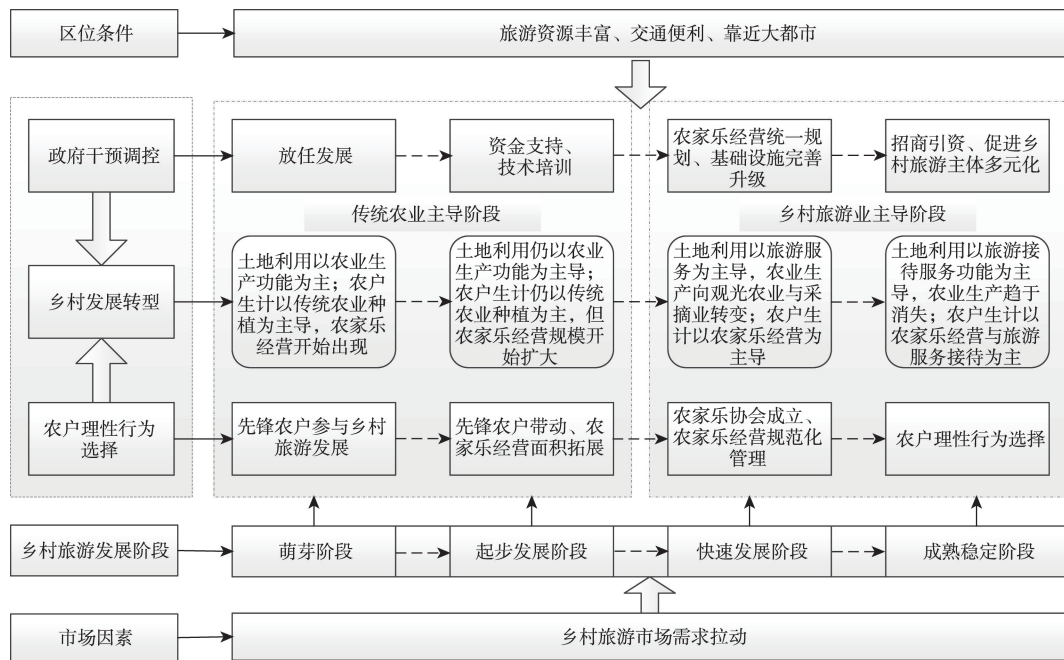


图6 旅游驱动下上王村转型发展机制

Fig.6 Mechanism of tourism-drive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hangwang Village

华山、翠微宫啊,都在我们村周边,来游玩的人很多,我们村沾了很大的光。”同时,环山路、子午大道的开通和西洋路的改造完成,降低了城市居民出行的时间成本,进一步提高了上王村的交通区位优势。如村支部副书记王某所述:“我们这离西安市区近,开车也就半小时。环山路修建完成把周围的一些景点都连了起来,就连学生骑自行车来玩的也越来越多。”

政府适时的调控是“稳定器”和“方向盘”。上王村的转型发展不仅是村庄农户及其通过自组织自下而上参与乡村旅游的结果,也是政府自上而下适时干预支持的结果。在发展初期,政府通过为上王村农户经营农家乐提供启动资金,保证了乡村旅游的起步和开展。调研的先锋农户阮某有如下表述:“当时政府担保,很多村民都获得了无息贷款,才让我们这几十户农家乐发展起来的。”在乡村旅游发展标准化与产业化时期,政府不仅对上王村农家乐进行统一规划布局,形成了特有的兼具关中民居风貌的复古建筑群,还对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提高了旅游环境容量和承载力,为乡村旅游业的规模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乡村旅游的多元发展时期,政府出台招商引资政策,引进新的旅游经营主体,完善上王村旅游服务功能,促使上王村向具有复合功能的旅游目的地转变。

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壮大是上王村转型发展的外源拉动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回归自然和乡村、体验农耕和田园生活成为城市居民新的追求,2016年中国乡村旅游人次已达13.6亿^[30]。在这一背景下,上王村凭借独特的区位条件,以周边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依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截至2017年底,年接待游客200万人次,实现旅游

年收入9000万元,逐步实现了传统农业村到旅游专业村的转变。

农户的理性选择是上王村转型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乡村旅游发展初期,少数具有冒险精神的先锋农户起到了引领作用。随着其经济效益的显现,逐渐产生了农家乐经营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带动农户生计向乡村旅游方向转型。正如调研农户王某说:“那时候还是我亲戚鼓励我发展农家乐,我一看他家农家乐天天都有人,我也发展了农家乐。”此后,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农户不断从传统农业脱离,扩建农家乐经营场所,导致上王村专业化生计活动的形成、用地强度的提高和用地结构的变化,乡村的转型发展也因此得以实现。

3.4 旅游驱动乡村转型发展的案例较析

结合已有相关研究成果^[35],将同处陕西省秦岭地区、同以发展乡村旅游为特色、位于商洛市金丝峡景区旅游专线沿线的4个村(丹南、太子坪、落花沟、庙台子)作为对照组,与上王村进行比较,进一步探究旅游驱动下不同乡村转型发展在微尺度的异同(表6)。选取其与上王村进行对比分析的原因如下:首先,对照组村庄与上王村所处地理单元相同,但在微观区位上存在“景边村”与“城郊村”的差别,以此展开对比分析,具有空间上的可比性,同时更能反映区位特征对同一驱动力影响下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其次,对照组村庄与上王村开展乡村旅游且受其影响的时间节点相近,两者也具有时间上的可比性。

由表6可知,上王村和金丝峡景区专线沿线4村的区位特征有明显差异,原本均为传统农业村庄的两者在多年发展后分化为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其旅游开发乃至乡村转型发展都呈现出不同特

表6 旅游驱动乡村转型发展的案例较析结果

Tab.6 Case comparison of tourism-drive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项目	西安市上王村	商洛市金丝峡景区专线沿线4村
区位特征	地处秦岭北麓冲积扇平原、特大城市近郊,邻环山路及秦岭野生动物园等景点	地处秦岭南麓腹地、5A级景区旅游专线沿线,距商洛市110 km、西安市230 km
类型	城郊型乡村旅游目的地	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地
客源市场	以西安市主城区市民为主,客源市场基本稳定、季节性波动不大	以来景区的过路游客为主,客源市场的季节性特征强、淡季变化明显
外部空间形态	规整的团簇状	时断时续的条带状
内部用地结构	面向旅游的住宅用地和产业用地为主,所占比重已有40%	仍以林地等非建设用地为主,建设用地比重不到20%
农户生计活动	旅游接待服务为主导,生计活动相对单一	外出务工和农家乐经营为主导,生计活动的多样性和季节性较强
乡村体制	旅游专业村	务工与旅游服务复合体制

点。究其原因,主要是两者在地形条件、依托资源、客源市场等方面的不同,引致其乡村旅游产业规模化、专业化、集群化程度的差异,进而影响了两者的乡村转型发展过程和表征。具体分析如下:

(1) 地形条件。地形条件不仅决定村庄分布形态,对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也存在重要影响。依托平坦地形而形成的团簇状用地布局,有利于上王村内部不同旅游接待活动间的联系,有利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共享,推动了其乡村旅游产业集群的发育。与之相比,金丝峡景区4个“景边村”所处的崎岖地形和内部分散的居民点,不仅限制了设施的共享,弱化了旅游接待活动之间的联系,农户参与旅游的水平也因此呈明显的距离衰减规律,导致这些村庄旅游业的发展表现出沿公路条带状散布的特征。距离旅游专线较远的农户,仍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方式,不仅限制了乡村旅游的规模化发展,也拉低了乡村转型发展的程度。

(2) 依托资源。秦岭野生动物园等周边旅游景区的建设推动了上王村乡村旅游的发展,金丝峡景区的开发则以自然资源的锐减为效应,迫使旅游专线沿线4村农户的生计转向旅游接待和其他方向。然而,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由于注重外来资金的引入与自身品牌的打造,上王村发展为一个集多种旅游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专业村,逐步弱化了对周边旅游资源的依赖,乡村成功转型。与之相比,金丝峡景区的4个“景边村”由于区位条件的限制,乡村旅游发展受所依托景区的影响极大,特别是囿于自然风景区旅游的季节性特点,村庄农家乐经营状况的淡旺季变化大,在旅游淡季需外出务工维持生计,农户生计的旅游化转型难以持续和彻底,不仅限制了这些村庄旅游业的发展,也阻碍了村庄向旅游专业村的转型。

(3) 客源市场。上王村地处西安大都市边缘区,以西安市主城区为基础客源市场,消费群体庞大、客源充足。此外,由于上王村乡村旅游发展已由农家乐接待走向民俗体验、休闲农业和温泉养生等,旅游产品的互补性和多样化程度明显提高,客源的稳定性较强、季节性波动不大。与之相比,金丝峡景区专线沿线4村离大城市较远,客源以外来过路游客为主,加之高度依赖景区人流造成的季节性波动,致使这些村庄的旅游业难以形成稳定的客源市场,进而造成村庄旅游业专业化程度的不足和乡村转型发展程度的相对较低。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从多要素综合视角出发,融合多源数据,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对“城郊村”在旅游驱动下的转型发展过程和机制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区位特征和发展类型不同的4个“景边村”进行对比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从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2个维度构建的概念模型适宜于乡村转型发展微尺度的研究。伴随乡村旅游发展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上王村的土地利用日益多样化、复合化、旅游化,功能布局的“核心+边缘”结构一直明显;农户生计方式组合渐进更替,生计活动趋于非农化、专业化,家庭就业、收入、消费与旅游的相关性不断提高,上王村由传统农业村转型为乡村旅游目的地。

(2) 优越的区位条件是上王村转型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府适时的调控是其“稳定器”和“方向盘”,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壮大是其外源拉动力,农户的理性选择是其内在驱动力。

(3) “城郊村”和“景边村”的旅游开发及其驱动下的乡村转型发展具有不同表征。案例村在地形条件、外部资源依赖程度、客源市场规模及稳定性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两者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分化,进而影响了其转型发展的程度和深度。

4.2 讨论

乡村地域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开放式系统,具有其特有的要素、功能与结构。因此,乡村转型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发展过程,而是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与城市互动,形成良好的城乡互补关系,进而促进乡村生产系统、生活系统、生态系统的优化重构。然而,现有的村域研究多以土地利用变化、空间重构或产业发展等单一要素为主,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但仍缺乏综合的研究视角。本文从土地利用演化与农户生计变化出发,研究微观尺度的乡村转型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从单要素出发探究乡村转型发展的不足,对今后乡村转型研究的深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此外,本文在个案研究基础上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即使位于同一区域、发展动力一致的村庄,其发展也会产生分化,转型程度亦有区别。这一结论一方面仍需在后续研究中通过更多的案例比较来验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乡村振兴的政策实

践中,不能搞一刀切,应科学把握乡村的类型、区域和发展阶段差异性,根据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现状及动力来源等,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现阶段,中国出现许多盲目“跟风”“逐利”式的乡村旅游地,生搬硬套成功乡村旅游地的发展模式,不仅不会促进乡村转型发展,反而造成乡村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对乡村地域系统造成了极大损害。因此,旅游促进乡村转型发展并不能千篇一律,应通过不断探索适合当地特定情况的开发模式,同时注重创新、文化、品质、品牌、区位以及利益机制6要素才能实现良性发展^[30]。因此,如何根据中国乡村发展现状阶段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区域乡土人情特点与资源禀赋,探究符合具体村庄的旅游驱动转型发展路径与模式,将是接下来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刘彦随, 刘玉. 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J]. 地理研究, 2010, 29(1): 35-42. [Liu Yansui, Liu Yu. Progress and prospect on the study of rural hollowing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1): 35-42.]
- [2] McGee T G. Managing the rural-urban transform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J]. *Sustainability Science*, 2008, 3(1): 155-167.
- [3] 龙花楼, 邹健. 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转型发展 [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2(4): 97-100. [Long Hualou, Zou Jia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1, 32(4): 97-100.]
- [4] 李婷婷, 龙花楼. 基于“人口—土地—产业”视角的乡村转型发展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5, 35(10): 149-155, 138. [Li Tingting, Long Hualou. Analysi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from the viewpoint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The case of Shandong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0): 149-155, 138.]
- [5] Xu W, Tan K C. Impact of reform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n rural system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Yuhang, Zhejiang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2, 18(1): 65-81.
- [6] Long H L, Zou J, Pykett J, et al. Analysi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J]. *Applied Geography*, 2011, 31(3): 1094-1105.
- [7] Liu Y S, Long H L, Chen Y F, et al.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urba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and future prospects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6, 26(8): 1117-1132.
- [8] 贺艳华, 范曙光, 周国华, 等.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湖南省乡村转型发展评价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667-676. [He Yanhua, Fan Shuguang, Zhou Guohua, et al. Evaluatio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Hunan Province based on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667-676.]
- [9] 李玉恒, 阎佳玉, 武文豪, 等. 世界乡村转型历程与可持续发展展望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627-635. [Li Yuheng, Yan Jiayu, Wu Wenhao, et al. The proces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and prosp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627-635.]
- [10] 李二玲, 胥亚男, 雍雅君, 等. 农业结构调整与中国乡村转型发展: 以河南省巩义市和鄢陵县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698-709. [Li Erling, Xu Yanan, Yong Yajun, et al.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Taking Gongyi City and Yanling County as exampl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698-709.]
- [11] Kiss E. Rural restructuring in Hungary in the period of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J]. *Geojournal*, 2000, 51(3): 221-233.
- [12] Abrams J B. Restructuring of land and community in the remote rural west: The case of Wallowa County, Oregon [D]. Oregon State, USA: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2011.
- [13] Torres R M, Carte L. Community participatory appraisal in migration research: Connecting neoliberalism,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mobility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4, 39: 140-154.
- [14] Hedlund M, Lundholm 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weden: Employment transition and out-migration of three cohorts born 1945-1980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5, 42:123-132.
- [15] 屠爽爽, 龙花楼, 李婷婷, 等. 中国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 [J]. 经济地理, 2015, 35(12): 141-147, 160. [Tu Shuangshuang, Long Hualou, Li Tingting, et al. The mechanism and models of villag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2): 141-147, 160.]
- [16] 杨园园, 臧玉珠, 李进涛. 基于城乡转型功能分区的京津冀乡村振兴模式探析 [J]. 地理研究, 2019, 38(3): 684-698. [Yang Yuanyuan, Zang Yuzhu, Li Jintao. Rural revitalization mod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functional zon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684-698.]
- [17] 臧玉珠, 杨园园, 曹智. 大城市郊区乡村转型与重构的典型模式分析: 以天津东丽区华明镇为例 [J]. 地理研

- 究, 2019, 38(3): 713-724. [Zang Yuzhu, Yang Yuanyuan, Cao Zhi. Typical model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structure in suburban areas: A case study of Huaming Township in Dongli District, Tianjin C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713-724.]
- [18] 李婷婷, 龙花楼.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 以山东省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4): 531-541. [Li Tingting, Long Hualou. Study on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4): 531-541.]
- [19] 戈大专, 龙花楼, 李裕瑞, 等.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粮食生产系统多功能转型时空格局研究: 以黄淮海地区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8, 38(4): 147-156, 182. [Ge Dazhuan, Long Hualou, Li Yurui, et al.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multi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case of Huang-Huai-Hai Plain.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4): 147-156, 182.]
- [20] 黄丽娟, 马晓冬. 江苏省县域经济与乡村转型发展的空间协同性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8, 38(6): 151-159. [Huang Lijuan, Ma Xiaodong. Spatial coupling cooperativ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6): 151-159.]
- [21] 李婷婷, 龙花楼. 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 [J]. *地理研究*, 2014, 33(3): 490-500. [Li Tingting, Long Hualou. Study on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3): 490-500.]
- [22] 龙花楼, 李婷婷, 邹健. 我国乡村转型发展动力机制与优化对策的典型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1, 31(12): 2080-2085. [Long Hualou, Li Tingting, Zou Jian. Analysis of dynamical mechanism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ypical regions of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31(12): 2080-2085.]
- [23] 郭炎, 唐鑫磊, 陈昆仑, 等. 武汉市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J]. *经济地理*, 2018, 38(10): 180-189. [Guo Yan, Tang Xinglei, Chen Kunlun, et 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Wuhan City.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10): 180-189.]
- [24] 席建超, 王新歌, 孔钦钦, 等. 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与土地利用模式: 野三坡旅游区三个旅游村落案例研究 [J]. *地理学报*, 2014, 69(4): 531-540. [Xi Jianchao, Wang Xinge, Kong Qinqin, et al. Spatial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duced by tour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Yesanpo tourism area,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4): 531-540.]
- [25] 朱琳, 黎磊, 刘素, 等. 大城市郊区村域土地利用功能演变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以成都市江家堰村为例 [J]. *地理研究*, 2019, 38(3): 535-549. [Zhu Lin, Li Lei, Liu Su, et al. The evolution of village land-use function in the metropolitan suburbs and its inspir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jiayan Village in Chengdu C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535-549.]
- [26] 吴丽敏, 黄震方, 曹芳东, 等.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 以周庄为例 [J]. *地理研究*, 2015, 34(3): 587-598. [Wu Limin, Huang Zhenfang, Cao Fangdong, et al. Land use pattern evolutio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of an ancient tow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Zhouzhua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3): 587-598.]
- [27] 席建超, 王新歌, 孔钦钦, 等.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 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J]. *地理研究*, 2014, 33(10): 1928-1941. [Xi Jianchao, Wang Xinge, Kong Qinqin, et al. Micro-scale soci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tourist village in the past 25 years: A case study of Gouge Village in Yesanpo, Hebei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10): 1928-1941.]
- [28] 郭文, 王丽. 文化遗产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认同研究: 以无锡惠山古镇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5, 35(6): 708-716. [Guo Wen, Wang L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identity in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 of Huishan Ancient Town in Wuxi,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6): 708-716.]
- [29] 吴吉林, 刘水良, 周春山.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 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7, 37(12): 232-240. [Wu Jilin, Liu Shuilang, Zhou Chunshan. Peasant households adaptabi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4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ngjiajie.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12): 232-240.]
- [30] 陈佳, 张丽琼, 杨新军, 等. 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和社区旅游效应的影响: 旅游开发模式视角的案例实证 [J]. *地理研究*, 2017, 36(9): 1709-1724. [Chen Jia, Zhang Liqiong, Yang Xinjun, et al.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hanges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and community tourism effect: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9): 1709-1724.]
- [31]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 [J]. *地理学报*, 2017, 72(4): 563-576.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Ac-*

- 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 [32] 龙花楼, 屠爽爽. 乡村重构的理论认知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581-590.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rural restructur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581-590.]
- [33] 王子侨, 石翠萍, 蒋维, 等. 社会—生态系统体制转换视角下的黄土高原乡村转型发展: 以长武县洪家镇为例 [J]. *地理研究*, 2016, 35(8): 1510-1524. [Wang Zhiqiao, Shi Cuiping, Jiang Wei, et al. R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me shifts of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in the Loess Plateau: A case study of Hongjia Town in Changwu County,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8): 1510-1524.]
- [34] 席建超, 赵美风, 葛全胜. 旅游地乡村聚落用地格局演变的微尺度分析: 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 [J]. *地理学报*, 2011, 66(12): 1707-1717. [Xi Jianchao, Zhao Meifeng, Ge Quansheng. The micro-scale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use pattern: A case study of Gouge Village of Yesanpo Scenic Area in Hebei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12): 1707-1717.]
- [35] 喻忠磊, 杨新军, 杨涛. 乡村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模式及影响机制: 以秦岭金丝峡景区为例 [J]. *地理学报*, 2013, 68(8): 1143-1156. [Yu Zhonglei, Yang Xinjun, Yang Tao. Exploring conditions, determinants and mechanisms of rural households' adaptability to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Jinsixia in Qinling Mountain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8): 1143-1156.]

Micro-scale study o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driven by tourism: Taking Shangwang Village in Xi'an City as an example

WU Kongsen¹, RUI Yang^{1*}, CHEN Jia¹, ZHANG Liqiong², YANG Xinjun¹, ZHANG Baigang¹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The Library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multi-factor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a conceptual model of micro-scale rural regional system was constructed with land use and livelihood dimensions. Taking Shangwang Village in Xi'an City as an example, and using remote sensing images, survey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 data,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 use and the livelihood change of farmers in a "suburban village". On this basis, four "scenery-surrounding villages" with different 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ype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obtained: 1) With the scaling-up and specialization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land use of Shangwang Village has gradually become diversified, compounded, and tourism-focused. The combination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begin to change,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mployment, income, consumption, and tourism continues to increase. Shangwang Village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village to a destination for rural tourism. 2)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hangwang Village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ts superior location is the ba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timely interven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government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t market of rural tourism is its ex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the rational choice of farmers is its internal driving force.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uburban village" and the "scenery-surrounding villages" in terms of terrain condition, resources endowment, and tourist market due to their different locations have led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have affected their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es.

Keywords: rural tourism;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land use; livelihood change; Shangwang Village in Xi'an City